

论红船精神与文化自信相契合的三重维度

任媛¹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 从动因导向、纲领指向和实践方向三个方面, 考察了红船精神与文化自信契合性的理论机理和现实表征。红船精神所反映的建党伟业是先进的中国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件。更好发挥红船精神夯实文化自信的功能, 就要挖掘红船精神所依托的红色文化资源, 阐释红船精神所反映的文化自信的内容结构, 总结红船精神蕴含的文化发展规律。

【关键词】: 红船精神 文化自信 三重维度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1)02-0078-05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的精神提炼, 它处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起点位置。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牵引, 它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价值灵魂、文化根基和时代特征。尽管红船精神同文化自信面对不同的时代条件与时代任务, 但其制度追求、价值立场、文化传承、精神气质是完全一致的。深入阐释红船精神同文化自信相契合的内容, 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际, 更好发挥红船精神夯实文化自信独特功能的必然要求。当前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有诸多论述, 但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 研究的实践色彩浓于理论色彩, 许多研究侧重于红船精神在干部教育、学生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问题的操作层面, 而对两者内在关联的理论归纳不足。第二, 系统论述红船精神同文化自信关系的研究很少,^[1]散见于红船精神同传统文化的关系、革命精神谱系、红色文化传承等文化建设问题中。因此, 本文将从动因导向、内容指向和实践方向三个方面入手, 考察两者相契合的具体表现。

一、红船精神与文化自信相契合的动因导向

文化自信问题, 由文化发展不平衡产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产生的分析视角, 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生产、交换的全球扩张,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交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2]31} “一句话,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32} 对被纳入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近代中国而言, 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态度, 即文化保守主义的自负心态和“全盘西化”的自卑心态。这两类心态虽然处于两个极端, 但本质上都是文化不自信的反映。费孝通先生认为, 这种文化困惑是 21 世纪人类共同的危机, 是由一个世界性文化转型期带来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3]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再一次融入世界, 文化交锋卷土重来。一方面, 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消费化、娱乐化侵蚀了文化自信的价值基石。一些文化制作方在利益推动下一味追求收视率、卖座率, 忽视作品内容的内在价值和制作水准, 使作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脱节; 文化消费方为追求单纯的感官享受而沉溺于庸俗媚俗的文化商品中, 忽视了对自身精神境界的修养和提高。另一方面,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再次碰撞, 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蚕食了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其主要的表征为文化虚无倾向, 各种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中共党史的歪曲或直白或隐秘, 带动了社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毗必中

¹作者简介: 任媛(1982-), 女, 山西吕梁人,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KS022)

国”不良心态；国内一部分人西化心态活跃，他们利用改革进程中的不完善诉说自己的文化主张与政治意图；虽然文化保守主义大势已去，但披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外衣有所抬头。上述文化领域的乱象，折射出民众心理或隐或现的对自身文化的不自觉不自信状态，其历史根源、心理根源必须回溯到近代中国的独特命运与百年中华民族的不屈奋斗史之中。

红船精神作为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早期共产党人探索国家民族命运实践的精神标志，在文化自信中发挥着对冲市场经济物化效应、矫正历史虚无主义消极影响的作用。

首先，红船精神对市场经济的物化效应有对冲作用。破解市场经济对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把人的精神追求、价值追求重新请回文化的核心，这就需要挖掘各时期、各类别能够启迪当代中国人心灵智慧、满足其精神需求、凝聚社会力量的精神资源，并将其有效地嵌入到各类文化生产机制中。红船精神所反映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是人的价值的高扬，所传播的红色文化是党的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方面通过执政党的政治教育可在全社会引领精神追求的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开发各种关于红船精神的书籍、影视作品、现场教育基地等红色文旅产品可丰富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

其次，红船精神的传播弘扬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有矫正功能。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谬误，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学术研究和认知教育。唯有摒弃主观主义和一叶障目式的认知方式、深入事物的内在本质，采用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的辩证方法，才能真正获得对问题的科学认识。^[4]红船精神的历史支撑，包括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早期党组织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等内容，而上述研究的深入完善，对“告别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思想”等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形成了有力的回击。除此之外，红船精神历史研究对近代中国的全景式回顾，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近代国情。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统治者的失败不单单是悲情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5]；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列强具有殖民扩张的“魔鬼”形象与文化传播的“天使”形象的两重性，^[6]但文化传播不是其主观意图，依靠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二、红船精神与文化自信相契合的内容指向

文化自信是对文化效能与生命力的确认，是更根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是特定环境下的人类历史活动的展开。费孝通先生在谈论文化自觉问题时指出，文化自觉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7]。这些观点实际上形成了文化自信内容界定的原则与依据，文化自信的内容应该从过去、现在、未来的维度展开，具体包括对文化来历的知晓，对文化特色的明确，对文化发展的确认。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是泛指对当代中国一切文化的自信，而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8]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特点，从纵向脉络上阐释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内容体系。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作始也简”的历史起点所蕴含的精神特质。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者。这种独特的时空方位使得红船精神形成了同文化自信内容体系的密切关系，表现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同革命文化的源流关系，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构关系。

第一，红船精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

新文化运动之后，近代中国文化界对于传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张岱年先生认为主要有三大类别：主张调和的“东方文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主张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盘西化”、主张辩证综合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9]。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正是第三类文化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之初至革命年代这段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表现为侧重于批判地继承，^[10]也就是说尽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出的早期共产党人都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从

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正确的传统文化观创造了条件。从建党前后阶段建党先驱的所思所为来看，红船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红船精神传承求大同的文化理想。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并经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阐发在近代得以发展。近代中国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传统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的现实导向中接受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11]这一点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身上都有体现。受孙中山的影响，陈独秀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经常使用“大同”的概念，在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思考中指出，“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12]1920年，毛泽东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同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念十分类似。其次，红船精神传承忧国忧民的文化品格。忧患意识是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要义。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早期党组织建立诸多环节上，知识分子群体都发挥了主体地位。以党的早期组织为例，58名党员有57名都是知识分子。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而言，大部分人参与党的创建不是为了追逐个人私利或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把创建党作为改变国家命运的希望。因此，这部分人身上形成“既具有近代民主国家观念和民主自由意识，同时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匡正天下的使命感和社会担当精神”^[13]的鲜明气质。

第二，红船精神同革命文化的源流关系。

革命文化，一般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革命精神为内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的先进文化形态和特殊文明成果。^[14]红船精神不仅是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革命文化的源头。首先，红船精神在纵向实践上处于革命文化的起点。考察革命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时间上限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与党的成立，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党组织发展、党的一大的召开都是红船精神所依托的具体历史事件，因此，红船精神在纵向实践上符合革命文化源头的要求。其次，红船精神为革命文化注入精神形态的红色基因。革命文化存在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两种形态，革命精神作为革命文化结构的核心，体现革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根本品质。党的革命精神形成了包括红船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在内的精神谱系，集中表现为坚定信念、顽强拼搏、不怕牺牲、勇于创新、为人民服务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红船精神首创、奋斗、奉献的精神内涵，充分说明党的成立起点同样是党的精神史的起点，建党伊始就为革命精神的传承发展注入了鲜明的红色基因。因此，红船精神在横向文化结构剖析中体现了与革命文化的源流关系。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15]

第三，红船精神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构关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革命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的传承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以开放包容、民族主体、科学理论、人民立场为基本属性的当代文化形态。红船精神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构关系体现在指导思想的同构、价值立场的同构、发展主题的同构方面，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不同历史实践结合的文化形态产物，遵循着共同的文化发展性质、方向、方法；两者都坚持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

三、红船精神与文化自信相契合的实践方向

文化自信的建立，核心问题在于解决“古今”“中外”问题，或者说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发展是客观规律起根本作用的前提下，主观能动发挥和客观规律制约共同作用的产物。文化发展表现为文化是能动的人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在一定的意志和目的驱使下，受到已有的经济政治事实、思想材料积累的基础上所创造的活动。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历程中，能动的人的文化活动则往往表现为围绕文化变迁产生的思想理论革新、政治组织缔造与发展路径选择。

红船精神诞生在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发展观分化之际，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以实现共产主义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为目标，是融科学的思想力量、为民的政党组织、坚持民族本体性的革命道路为一体的文化发展新走向。

第一，红船精神所蕴含的思想理论为文化自信提供了科学指南。

红船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新文化运动后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日渐广泛，其信奉者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组织，展开了思潮争辩、思想传播、组织构建等活动，其中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陈独秀等人与张东荪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陈独秀等同黄凌霜就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准备。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和决议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其精神实质、分析方法、奋斗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吸纳，使得近代中国拥有了一个新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一方面是最具科学性的学说，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又极具价值，是指导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压迫命运的学说，是指导被压迫民族摆脱殖民统治的学说。更为不易的是，在党的创建初期就已经能正确面对认识“古今”“中外”的问题，李大钊对孔子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6]待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后，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也同步形成。就此，毛泽东曾十分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7]

第二，红船精神的主体是推动文化自信的关键力量。

红船精神的主体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新型政党和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建党先驱群体。近代中国的文化变迁遵循着器物-制度-观念的由表及里、由末及本的过程，但制度层面的改革滞后影响了文化有机体的协同发展。一部分人抱残守缺和盲目自大，不会也不愿主动融入时代的潮流；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抛弃专制文化的思想枷锁，在文化立场上走上了否定传统文化的另一极端。建党先驱效仿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组织上以“主义”的集合摆脱了旧式政党建立在人身依附上的结党方式，而且从更大更广的范围内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从而把文化变迁的主体交给了最有动力进行变革的群体。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8]

第三，红船精神开辟新的革命道路为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凭借先驱们在一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践，在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走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以苏为鉴”，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三大历史贡献，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跨向强起来的历史进程。这也是一个反复同“古今”“中外”对话的过程，坚定民族自主性立场，借鉴西方文明，克服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教条主义、对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通过国家独立富强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更通过合理处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推动文化自信的有效达成。

综上所述，红船精神与文化自信相契合的三个维度表现为：在动因导向上与当下中国的文化境遇相呼应，形成对文化消费化、娱乐化的价值补充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精准回击；在内容指向上与文化自信的基础相吻合，展示出文化自信要处理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同革命文化的源流关系、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构关系；在实践方向上与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相符合，即文化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南，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中国道路为变革路径。

红船精神与文化自信相契合的三个维度实际上源自于红船精神与文化的两重关系：一方面，红船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气质的重要体现，本身就展现了文化核心的思想、价值、观念，进一步而言，红船精神作为革命文化的开端精神标识构成，处在文化自信内容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自然是夯实文化自信的重要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红船精神作为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所反映的建党伟业就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文化自信的重要政治活动，其蕴含的对批判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对代表广

大人民利益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对国人百年间思索文化自主化发展、时代化进步的一个有力的注解，必将体现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类型多元存在，文化格局西强东弱，文化竞争日益凸显，提升文化自信进而构筑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间保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工具。从国内发展来看，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文化功能多方渗透，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体制深入调整，坚定文化自信进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树立文化自信不仅是贯穿文化实践各方面的基本面向，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题中之义。“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弘扬红船精神，从文化自信的角度而言就是要深入挖掘红船精神中所展示的近代中国追求文化自信的奋斗经历、所内含的文化自信的内容、所体现的文化发展规律，从而再次为政党、为民族、为国家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彭冰冰.论红船精神与文化自信的内在契合性[J].嘉兴学院学报,2017(2):101-107.
-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3]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
- [4]张有奎.三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批判[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1):152-156.
- [5]刘润为.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J].红旗文稿,2017(12):4-7.
- [6]左玉河.“魔鬼”还是“天使”:帝国主义侵华“有功”论辨析[J].史学理论研究,2019(3):12-16.
- [7]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
- [8]金民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然性及实现路径[J].中原文化研究,2018(1):73-80.
- [9]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39.
- [10]陈金龙.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J].史学集刊,2021(1):4-8.
- [11]徐大同.中国人民拒绝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J].政治学研究,2012(3):14-19.
- [1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2卷[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6.
- [13]宋俭,魏维.论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11):4-10.
- [14]吴小英,李创伟.论革命文化在高校的教育困境及方法创新[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6):55-60.
- [15]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N].光明日报,2005-06-21(A3).
- [16]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80.

[17]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1.